

近九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现代性之路

李开玲

(盐城工学院 学生处,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上海老歌”标志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流行音乐自1980年代在大陆复苏,并逐步走向文化中心地带,呈现出突出的现代性;2000年以后,媒介技术日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主导了中国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方向,中国流行乐坛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症候。《现代性的有声书写: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从消费、技术、意识形态和审美四方面,展现了近九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独特境遇和文化生态,暗合文化现代性理论,显得颇为全面。

关键词:中国流行音乐;大众文化;传播媒介;意识形态;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4)01-0057-04

在国家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流行音乐产业的复苏与繁荣推助了社会文化生态的变更,流行音乐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国主流音乐,相关中国流行音乐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却鲜少学者从文化视阈中系统地研究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尴尬的文化身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样式,审美自足性不强,还不足以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对象,因此,相关流行音乐激烈论争的文章极为罕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代性的有声书写: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以下简称《有声书写》)^[1]属于文化研究范畴,研究对象是“流行音乐文化”,是处于意义之网中的流行音乐,而非与文学、舞蹈等艺术样式并列的“音乐”。事实上,中西文化研究都汲取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文本分析的方法,正如著名学者陶东风总结的:“文化研究要把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分析等打通,但又不能很牵强,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需要熟悉各个学科知识并对其加以熟练运用”^[2]。《有声书写》在社会现代化进程这个大坐标上考察流行音乐,既关注文本内在的艺术价值,又揭示了她与外在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从文化消费、媒介技术、意识形态和审美四方面,展现了近九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独特境遇和文化生态,暗合了文化现代性理论,说明了“中国流行音乐现代性”论题提出的

合理性和可证明性。

一、习见与史料:力避与钩沉

1980年前后,大陆对邓丽君及其唱法的争议之热烈、分歧之大就足以使得流行音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和学术研究对象,那么,近九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的现代性之路,不言而喻,更是一个热闹到近乎驳杂的话语盛宴,变幻无常的乐坛是动态的、随意的、杂乱的,和良莠不齐的,充满了争议的文本是结果,又更是历史发展的过程,相关研究散乱而不成体系,唯有下功夫钩沉史料,方能挖掘到隐藏在歌唱背后的意义体系。准确、丰富的史料是任何研究工作的基础,如果说避开习见,追求学术自由,选择文化身份在中国尚且还比较尴尬的流行音乐作为研究对象,是书作者独立意识的体现的话,那么,花功夫对大量音像史料的搜集、整理、悉心体味和理性探析,则体现了书作者良好的治学态度。

《有声书写》把“时代曲”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发生的重要标志,从老上海时期的旧音像材料、旧画刊校报中挖掘出了新鲜的学术论见,比如:“上海老歌持续性地建构着社会文化记忆,其包蕴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逐步成为民族文化基因的组成,显示出她突出的现代性;流行音乐、电影和电视等大众文化文本提供的都市体验,像一个肉眼看不

收稿日期:2014-01-10

作者简介:李开玲(1957-),女,江苏扬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高等教育。

见的现代化工程,有效地灌输了近现代意识;流行音乐以最贴心的人文关怀成为乡民从小农思想转到市民意识上的辅导读物等。”^[3]面对盘根错节的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紧扣现代性这一主要着眼点,书作者保持冷静与清醒,不让自己的注意力被驳杂的文化现象和风起云涌的思潮淹没,这是较为难得的;更难得是书作者能在感性的音乐文本中做出超然的文化反思。众所周知,流行音乐是感性的产物,以流行音乐作为学术论文的选题,“一如试图严肃地谈论玛丽莲·梦露那般困难,因为她实在太性感!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曾描述梦露毫不掩饰地闪耀着生命的光彩,又同时保留着难以置信的纯真。”^[3]不过,也许正因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真”,书作者才甘愿受其扰,悉心钩沉庞大芜杂的史料,努力呈现歌唱背后的进步、倒退、明净和饱满的现代性,较好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二、感性生命与理性论证:融通与生发

中国流行音乐在生产与消费关系中引发的诸多论争,使人们很难弄清她真实的文化面貌和存在意义,然而,阅读《有声书写》,却有茅塞顿开之感。《有声书写》既选取作品和现象做典型性分析,精研其意识形态策略,关注文本内在价值,将其上升到理性高度,同时也站在一定的学术高度,在梳理中国流行音乐在生产与消费关系中产生的诸多“事实与论争”的基础上,以西方现代性理论作为立足点,勾勒出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这样的写作思路可以看作对近年来学界一直在呼吁的学术研究要回归文本、回归原点的一次积极响应。

如果说执着于流行音乐的外部研究,体现了《有声书写》的理性思维特征,那么书中穿插的生动的乐评,则体现了书作者感性的一面,感性与理性交融于学术,也成为诸多读者对《有声书写》的主要印象之一。

《有声书写》的感性色彩主要体现在书中穿插的乐评被书作者当剧本来写,追求乐评的剧场效果。所谓的剧场效果就是入乎其内,感同身受,以结构戏剧的方式把欣赏主体的欣赏体验一幕幕地展现出来,注重结合旋律和歌词描述场景、营造氛围,“诱使”读者陷入乐评精心构置的“剧场”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例如,该书在论述张艺谋电影音乐的美学特征时穿插的乐评的剧场感就特

别强烈:“首先是深情之美,《山楂树之恋》的箏声散落在‘片头’、‘初会’、‘误解’、‘寻找’、‘隔河相抱’、‘诀别’等各部分,虽只是简单的单音弹拨,然细腻婉转,那份含蓄至极的东方爱情故事怀孕的深情缱绻,纤毫毕现,缠绵、质朴、柔和,从容地绽放在浓郁在民族风中,深情至极,感人至深。其次,悲壮之美,张艺谋电影音乐不仅擅长使用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表现深情之美和精致的情节,也能表现两军对峙的浩瀚气魄,表现兴亡与永恒的主题以及展现豪迈情怀与人世沧桑。比如《十面埋伏》中琵琶武曲,置人于‘千军万马声嘶力竭的厮杀呐喊’中,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千悲万恨四五弦,把自己和天地比附在一起,悲哉!壮哉!复次,苍凉之美,倘悲壮是高昂的,那么苍凉则是无奈的,苍凉能够唤起一种辗转于心的、不绝如缕的人心激荡,表现出潜藏在命运深处的一种无奈,无奈而又不甘,蛊惑人去超越和玩味,展现出一种细致委婉的人生情致。再如王菲演绎的《英雄》主题曲,‘人影幢幢有人倒下来,获得光荣……’等待英雄、歌颂英雄,非音空灵飘渺,配以大鼓、小锣、中提琴等各种乐器,中西合璧,格外显出一派苍凉肃穆的意境。还有浅白之美、诙谐之美和动感之美……”^[4]诸如此类,书中一曲又一曲,一幕又一幕的剧场版乐评,引领读者较为深入地体味到了张艺谋电影音乐审美现代性的内涵,那是一种建立在想像“古老东方”基础上,展示本民族较为稳定、原始的观念和习俗,是追求“商品时代的艺术自律”的文化实践行为,是一种超越政治阶级层面的文化回归,呈现出现代性的普遍特征——自身对抗性,是对权威文化和商业控制的“既抵抗又妥协”的矛盾性体现,其本质是“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现代性”。

对书作者乐于花精力写乐评,精心研究如何写好乐评这一点,笔者颇受启发。与文学批评界“空手道”高手横行的状况相比,中国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依旧不够系统和丰富,多即兴和感性的零星散论,少理性反思和系统阐释,多夸张矫情的叫好,少专业到位的批评和引导。在中国流行音乐产业日趋火爆的今天,亟需有艺术审美眼光以及文化解码能力的批评介入,且需“看得上”、“跟得紧”,注重深入其中,亲身体验作品。这一点,无疑,《有声书写》作出了努力,书作者尝试用写剧本的方式写乐评,讲究真实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欣赏经验,即个人的独到的体会与发现,这就保证

了乐评理论批评部分有创新的可能,不至于流落于凌空蹈虚和放言空论的“空手道”境地。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有声书写》入乎其内,身临其境,肯定了一部分中国流行音乐作品的艺术魅力,那么,出乎其外,《有声书写》的理性色彩首先表现在对西方文化理论资源审慎的态度,自2000年以后,在中知网上能检索到的相关流行音乐的学术性文章越来越多,动辄上万字,要么略知一二套用西方文化理论,堆砌晦涩的术语,空洞虚浮不知所云,要么语不惊人死不休、哗宠取宠、言不及义,将真正的流行音乐爱好者拒于千里之外。对此现状,《有声书写》也做出了回应,一方面书作者在理论阐发时尽可能平实晓畅,至少非文科大学生是读得顺的;另一方面,书作者力争在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创造中国式话语,这主要体现在第五章审美现代性部分的论述,比如:“林夕词‘缱绻忧郁的意象美’是其最有文学性,最富含艺术性的表现,林夕擅于用细致的文字捕捉生活的细节,挖掘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意象的塑造,让受众进入他所叙述的意境世界,并亲身感受……林夕词作意象丰富,构成了一个个独特的意境,如《皇后大道东》、《迷途》、《吸烟的女人》、《红》、《赤子》等。《吸烟的女人》通过‘烟、墨镜、车厢、路牌、路灯’以及‘淡绿衬衫、红黄灯号、艳丽的眼睛、烟圈’等意象,构造了一种香港市民孤独、冷漠,想要冲破牢笼又不得的意境……,造就一种浓情化不开的意境。将生活情景与人丰富强烈的感情交融在一起,物我两忘,意境朦胧。”^[2]书作者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理论在此加以运用、阐释,这对美学理论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发掘艺术潜质甚至革命性意义等问题有一定的启发。

《有声书写》的理性色彩还体现在对流行音乐文化价值的辩证分析、以及对相当数量作品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审慎评述中。比如,《有声书写》直言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垃圾多,但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失望情绪,并没有浇灭作者把中国流行音乐作为研究对象的热情,也丝毫没有怀疑研究对象的价值,她在《有声书写》的导言部分理性评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学术上重视的对象,不一定就是你在价值上肯定的对象。也正因为这样的理性坚持,《有声书写》才能较好地运用“辩证”二字,做到点面结合,辩证评析中国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作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品,承认其商品性并不

影响对其社会价值的认可,流行音乐不比任何高雅音乐或古典音乐轻薄,而且其为大众营造的视听世界显示其并非全部都是无需准备就能进入的直接消费品;相当数量被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是一种需要欣赏主体积极参与进行再创造的艺术品;真正好的作品是不怕被市场检验的,歌曲被创作出来自然是希望得到传唱,也只有与听众之间产生交换行为,作品的艺术性才能被展现出来。当然,不能说大家都喜欢,都去消费的就是庸俗的作品,没有人去消费的就是高雅艺术。”^[3]书中此类颇具思辨色彩启人思考的论述颇多,此不赘言。

要而言之,感性与理性交相辉映,展现了作者真诚治学、灵动有致而又不失率真锋芒的研究风格。

三、宏阔与贯通:严谨理论和翩翩逸趣

以上对《有声书写》的学术评述,大多集中在学术思路和风格等方面,其实,书作者清新活泼的行文风格颇有特色,尽显学术理趣。《有声书写》结构段落的方式多亲切的对话式,这在导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本研究首先,我们来看……研究范畴明确以后,即可开展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综述工作”,类似这样的文句几乎贯穿全文,不够理性,甚至有些口语化倾向,却能轻易、亲切地引领读者穿梭于理性阐释、逻辑思辨和感性描述之间,趣味盎然,从容优游,全然忘却自己正在与书作者进行着一次较为艰深的理论回溯。对书作者的语言风格不够学术化这一点,笔者反倒觉得这或许正是该书作者有意而为之,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逻辑论证的间歇,有机会展现作者的拾趣之乐和灵动的思想。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作者很享受这种“独得之乐”,有言为证:“在论文撰写所依赖的资料选择方面,避免直接使用由精英或者以精英姿态过滤后记录的文字,因为唯有适度卸下沉重的理性束缚,方能‘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3]。再者,对书作者不唯理性至上论结构文字的方式,或也可以欣然理解为作者从宏观着眼、大胆取舍的胆识、智慧,当然,这完全得益于书作者的真性情与才力。

然而,金无足赤,该书只从四个角度展开论证,略显粗放;其次,对“大众文化”问题以及“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尚有待进一步深化;再者,“流行音乐”作为概念本身在文中应该明确是

一种语境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如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上个世纪属于流行范畴,而在今天则成为了经典,这一点非常遗憾,书中没有提及。这些不足之处或许是囿于篇幅所致,并不影响该书学术价值和意义的呈现,且进而能够启迪读者的研讨和商榷。

参考文献:

- [1] 周晓燕. 现代性的有声书写: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2] 陶东风 刘张扬.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陶东风教授访谈[J]. 学术月刊,2007(7):156-160.
- [3] 周晓燕. 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文学院,2013.
- [4] 周晓燕. 张艺谋电影音乐:大众文化审美创造性突破的典范[J]. 电影文学,2013(1):47-48.

Nearly 90 Years to the Modernity Road of Chinese Pop Music

LI Kailin

(Technology Student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old songs” marks the occurrence of Chinese pop music. Pop music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music nearly 90 years. Pop music are showing an exciting modern since 2000. Pop music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means of presenting technology. Since 2000, the entire Chinese music has present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dernit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 such as instant, liquidity and lust and so on. 《About the Modernity of Audio Arts: In the Cultur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op Music》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unique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ecology of nearly 90 years Chinese pop music from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media technology, ideology and aesthetic four aspects, is coincident with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odernity and quite comprehensive.

Keywords: Chinese pop music; Popular Culture; Media technology; Ideology; Aesthetic modernity

(责任编辑:李 军)

启 事

本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和《CEPS 华艺中文电子期刊》,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在本刊稿酬中一并给付(另有约定者除外)。对此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说明。